

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中国文学编年史》

——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综述

汤克勤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汤克勤(1971-), 男, 湖南茶陵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广东嘉应学院中文系讲师, 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和古代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3-0411-02

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编纂的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共计 1400 万字, 于 2006 年 9 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武汉大学等 10 多所高校 30 余位学者精诚合作, 历时 6 年, 才告完成。2006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 “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编年史》(十八卷本)出版座谈会”在武汉大学、黄冈师院隆重举行, 50 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出版意义、重要价值和对中国文学编年研究进行了研讨。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十八卷本)的出版意义和重要价值

与会专家一致赞扬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出版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之前, 陆侃如、曹道衡、傅璇琮、刘跃进出版了《中古文学系年》、《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编年史》, 但都是断代史。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十八卷本), 是第一部通史, 填补了空白。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文学遗产》副主编刘跃进先生认为, 《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煌煌十八卷的篇幅, 从先秦到当代, 将中国文学相关资料重新编排下来, 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 为我们进一步思索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的出版,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学术前景。文化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说, 这套《中国文学编年史》, 规模宏大, 在文献使用、撰著体例等方面, 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武汉大学吴志达教授说: “陈文新主持编纂的这套 1400 万字的《中国文学编年史》, 实为一大创举。其规模之宏大, 文献之详实, 体例之精当, 真可谓前无古人。其意义不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毕沅编《续资治通鉴》之下。而《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加起来不过 900 余万字, 历史事实记载至元朝灭亡, 与之相比, 《中国文学编年史》更加浩大、完整。”

专家们还对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具有的多方面重要价值达成共识。83 岁的学界泰斗、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称, 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从历史意义来看, 誉此书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是当之无愧的。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邓绍基称赞《中国文学编年史》征引详博、抉择多酌,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嘉惠学林, 功德无量。他说: “现在这部贯通古今、新旧一治的大型文学编年史的出现, 昭示着编年体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史书形式在文学史著作中开创了新局面, 也就铸就了它的重要历史定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系韩

瑞亚教授说,该书对国外的研究和教学有重要价值。她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明清志怪小说研究,从基础性、工具性、资料性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编年史》作了高度评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黄霖教授认为,《中国文学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资料价值;它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这是一次在立足传统、借鉴西方基础上革新文学史编写模式的有益尝试,会推动文学史的革新。武汉大学陆耀东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出版对遏止浮躁学风很有帮助。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常务副主编张廷银先生认为,这套《中国文学编年史》不但对文学史研究有重大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看,确定作家重要作品的创作系年,对确定作品的真伪也是重要参考。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海文教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肯定了《中国文学编年史》的重要价值。

(二)《中国文学编年史》(十八卷本)引发的中国文学编年研讨

《中国文学编年史》总主编陈文新教授在出版座谈会上根据该书的编纂宗旨和特点谈了对中国文学编年的看法。他说,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纪传体一枝独秀。编年类的著作,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仍有大量空白。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明快和简洁。《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弥补其短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时间段方面,设立了阶段和时代;其二,不仅重视作家的作品和他所做的事情,也重视他说过的话,重视他和友朋之间的通信记录等,因为这样的一些“言”,有时候能够简明地把文学史的某些现象呈现出来;其三,在政治、经济、军事史料之外,特别重视文化史料,因为文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更为内在,也更具有全局性。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长江学者陈平原先生根据撰写《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散文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纪事》的经验认为,在文学史写作中,应当使纪传、编年、通识这三驾马车相互协调,并认可“文学史可以有各种写法”。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教授认为,编年史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的大规模采用,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黄霖教授就文学史是什么、编年史怎样编写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才、学、识是治史的基本条件,在编年史中,学与识的问题尤为重要。“识”对编年体而言,就是在博的基础上取“精”的问题。编年史的作者应在这方面下大工夫,注意引用史料的准确性。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副所长王璠玲教授指出,近年来的一些文学研究趋势,如“接受美学”和“文学生产”的观念,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视,从性别视角进行研究,跨文类研究,重视新材料,等等,这些研究趋势,都在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中有所体现。《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鲁小俊博士通过抽样分析,有力地证明了该书是建立在深入普查文献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如何在关注众多文学活动的同时“回归文本”,是文学编年史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刘加夫教授说,文学编年史著作的编撰者应当用“全、准、精”的标准来搜集运用史料,以兼具“才、学、识”三长的标准来鞭策激励自己。《中国文学编年史·晚清卷》主编、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王同舟博士就该书在采用新体例时要解决好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了说明。《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主要撰稿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韩高年结合周秦文学的编年,谈了该书在先秦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创获。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余来明博士指出,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使我们在把握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时更有发言权。黄冈师范学院吴晓峰教授谈了“新时期文选学研究的编年问题”。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参观考察了黄州东坡赤壁和禅宗发祥地黄梅五祖禅寺。